

多维视野下的 清代黔铅开发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Lead-zinc Deposit in the Qing Dynasty
in Multi-dimensional View

马 琦 著

多维视野下的 清代黔铅开发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Lead-zinc Deposit in the Qing Dynasty
in Multi-dimensional View



马 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 / 马琦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2317 - 4

I. ①多… II. ①马… III. ①铅矿物 - 资源开发 - 研究 - 贵州 - 清代 IV. ①F4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7930 号

·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 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

著 者 / 马 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卫华

责任编辑 /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7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317 - 4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马 琦 1978年出生，陕西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边疆史地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参与国家级课题8项。出版著作《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东川铜矿开发史》《近代中国经济地理：西南卷》，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史研究》《复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装帧设计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Telephone 010-5936710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编委会

主任委员：张瑞才

副主任委员：江 克 余炳武 戴世平 宋月华

委员：李 春 阮凤平 陈 勇 王志勇

蒋亚兵 吴绍斌 卜金荣

主编：张瑞才

副主编：卢 桦 金丽霞 袁卫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编辑说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是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2011 年开始立项建设，在整合研究力量和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效显著，产生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2016 年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组织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从 2016 年开始编辑出版，拟用 5 年时间集中推出 100 本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云南省社科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资格审查、初评、终评的遴选工作，按照“坚持正确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的标准，遴选出一批创新团队的优秀成果，

根据“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推动学术研究，促进云南社会科学学术建设与繁荣发展的目的。

编委会

2017年6月

序

继《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后，马琦又一本关于清代西南边疆矿业研究的力作即将付梓，作为他在该领域研究的见证者，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更愿意将其十年来曾经与我分享的研究旨趣和多维视野拓展的体会贡献出来。

以往学界在地方经济开发史视角下研究矿业开发史或矿业经济地理的成果盈篇累牍，但却常常陷于一些问题难以解决的困境。历史上，我们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各类矿种，但某些矿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开发则晚于矿种认识很多年。例如“铅”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在 7000 多年前，人类已经认知了金属铅。我国文献中，《史记·夏本纪》称青州有“丝、枲、铅、松、怪石”^① 等物产，《管子·地数篇》说“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史记·货殖列传》载“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瑩瑁、珠玑、齿革”，《史记集解》徐广注曰：“（连）音莲，铅之未链者。”^② 据此推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的夏朝，先民就已经认知了金属矿物铅，先秦时代将尚未冶炼的铅矿称为“连”，并知晓了铅银伴生矿。青铜时代，青铜器铸造中已经用了铅，铅主要作为铸造青铜器的配制原料使用。然而，作为铸钱的币材，铅则是严禁的。《史记·平准书》指出郡国犯奸铸币的重要特征是在铜钱中“杂以铅锡”，致“钱多轻”，故“县官以令禁之”^③。说明西汉铸钱禁止掺杂铅锡。此后历代铸币几乎都禁“杂铅锡”，避免劣币泛滥，扰乱国家币制稳定。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铅主要作为铸造铜制器皿的配制原料使用，铅的用途和开发极其有限。但是

① 《史记》卷 2《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 55 页。

②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68 页。

③ 《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430 页。

到了清代，深埋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黔铅得以大规模开发，其驱动因素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地方经济视角，而必须结合铅的用途扩大及其在国家战略层面价值意义的提升而综合考量。基于此，马琦以多维视野展开清代黔铅开发研究。

首先，作者在国家资源视野下研究清代黔铅开发。人类社会就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发展史。矿产是自然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对矿产资源的利用程度则取决于人类对资源的认识水平和利用技术。进入文明时代，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形成了自然人和国家两类资源利用主体。个体的自然人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而不断加深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而国家往往掌握部分特种资源，如作为币材资源的铜进行垄断性开发，以保证全国的币制稳定、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马琦以国家资源观为切入点，对清代币制进行充分研究，发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货币需求量剧增，而原有的货币铸造发行规模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钱荒”^①。为了解决“钱荒”，国家一方面允许外洋白银流入，另一方面被迫调整钱法，扩大币材的来源、加大铸币量。正如马琦研究所指出的，康熙、雍正时期钱法调整中的一大特点是加大了制钱中的铅含量，形成“铜六铅四”的配铸比来应对铜的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铸币需求，铅成为清代仅次于铜的重要币材。马琦研究得出“从雍正二年至道光八年，黔铅总产量达8.72亿斤，年产839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的67%~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将黔铅开发上升到国家特控资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这是矿业开发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其次，在国家安全视野下研究黔铅开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进入热兵器时代的现代战争实际上是资源消耗的对抗。清代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热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具有军事价值的矿产资源成为提高武器性能、保障军队战力、巩固国防安全的关键。火药在我国很早就应用于军事领域，并发明了火药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推进发射物急速运动的射击类杀伤性武器。宋元以来，

^① 袁一堂：《清代钱荒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我国火器的发射物主要是石块、铅丸和铁弹，而铅以其熔点低、硬度弱、可塑性强及有毒性等特点，逐渐成为明清时期火器弹丸的标配，“制备铅弹，以供枪炮之用”^①，铅便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因此，马琦将黔铅开发与清代军事装备发展，以及边疆重大战事结合起来研究，发表了《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②一文。他又在本书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发现在黔铅大规模开发之前，清代军铅严重短缺，军队“枪手演习，止放空枪，从未装入铅子打把，似此则信手高低，漫无准则”^③。雍正时期黔铅开发全面展开，故从雍正七年开始，清军训练一律“用铅子打把”^④。马琦研究得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20万~26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黔铅开发保障了清军火器弹丸的有效供给，黔铅的军事用途在历次维护统一和边疆安全的重大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康熙、雍正平定准噶尔时，清军已能“炮火铅弹，多带备用”^⑤。乾隆征缅战争中，云贵总督彰宝奏：“军营火药铅弹前已运过五万五千余斤，现在腾越存贮尚多。”^⑥虽然军铅并非全部产自贵州，但清军装备改善、重大边疆战事中铅弹供给充足与黔铅大规模开发的时间吻合，折射出黔铅开发在军备战略物资与国家安全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再次，在国家治理的视角下探讨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马琦通过对清代黔铅矿分布和开发区域的细致考察，指出清代黔铅开发的重点地区位于贵州西北部的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该地元代为部落首领充任“蛮夷官”的辖制区^⑦，明代为土司辖地，国家只能通过土司对该区域和当地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管理。明代虽然急需铅矿资源，但无法深入土司辖区进行大规模开采。清代黔铅开发得益于两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一，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

^①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丁丑。

^② 马琦：《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 《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84，雍正七年闰七月乙亥。

^④ 《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84，雍正七年闰七月乙亥。

^⑤ 《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107，雍正九年六月甲午。

^⑥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847，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是月。

^⑦ 陆韧：《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

流”，清康熙三年（1664）平定水西宣慰使安坤叛后，设置为大定府，下辖黔西、平远、威宁三州和毕节县，使黔铅主要矿区从土司间接管理变为国家直接治理，为国家主导下的黔铅大规模开发和战略资源全面管控创造了条件；其二，马琦研究发现，改土归流使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逐步深入的同时，自康熙时代起，政府实施了具有区域导向性的“开边禁内”的矿业开发政策。“改土归流”与“开边禁内”两项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政策的互动作用，促使西南边疆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同时，为国家大规模资源开发创造了条件。黔铅的兴盛吸引了大量的内地移民，促进了黔西北的垦殖开荒和水利兴修，带动了贵州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和城镇的发展，而黔铅产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也成为贵州地方政府进行公共事业建设和社会经济管理的主要财政来源。国家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边疆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得到了有力诠释。

最后，用历史经济地理与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这是该书用力最深勤、研究最精到、创新最突出的地方。马琦研究发现黔铅采冶地虽然在贵州，但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需求则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所以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必须跳出了地方开发史的窠臼和主要运用地方志的局限，以多维的视野进行国家全局性的思考，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档案、实录、会典、方志等资料。例如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矿产量估算问题，马琦便在清宫中档中找到了雍正至道光时期相关官员向中央上报的黔铅逐年生产、贮存、购销、运输奏报，以及地方志中无法反映的黔铅开发制度体系、地方官兼职矿务管理的运作机制等方面的资料。在大量新发现资料的支撑下，作者在清代黔铅开发的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与产业兴衰；清代黔铅矿厂运作、抽买制度与管理机制；清代黔铅产销关系演变与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调节；黔铅运输交通地理与分销渠道；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六个方面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的实证研究。多维视野下的研究思考和全方位的资料收集，为该书取得超迈前人的研究进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矿业开发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典范，更能客观准确地揭示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当作者通过扩大视野，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引向国家资源、国家安全、国家治理层面而取得重大突破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忽略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地区性问题的思考。例如该书就缺乏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黔铅开发的研究，贵州铅锌矿集中的黔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生态脆弱，加之清代 150 余年传统采治方式下的高强度黔铅开发，必然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危机。黔铅开发的衰败除了作者书中探寻的原因外，生态环境的破坏使黔铅开发无以为继也是重要原因。黔铅开发辉煌退去之后造成的石漠化，成为当地居民长期深度贫困的重要原因，其影响至今，使黔西北成为全国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难度最大的滇黔桂石漠化区的核心地带。因此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矿业开发史研究，理应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再有，清代“开边禁中”政策下西南边疆矿业开发中的民族关系、边疆社会变迁、生产生计方式变化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或专题研究。因此该书拓展了清代黔铅开发研究的思考维度，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去拓展、去思考、去探索，期待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陆 韬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天水家园

2018 年 3 月 30 日

前　　言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战略性资源的管控是国家或政权关注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皆然。探讨古代国家认识、开发、利用战略资源的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传统社会管控战略资源的政策、措施及其成败得失，可为现代国家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古代资源开发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经济史、矿业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热点问题。

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且不可再生，替代性差，在资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史中，清代矿产资源开发成就最为突出，以滇铜、黔铅采冶为代表。清代滇铜开发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然而作为与滇铜齐名的黔铅，其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 黔铅是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黔铅是清代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是指贵州所产的金属锌和金属铅。因铅与锌在清代统称为铅，别以黑白二色。清代铅锌主要用于鼓铸制钱。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顺治元年（1644）“以红铜（金属铜）七成、白铅（金属锌）三成配搭鼓铸”，康熙二十三年（1684）改为“铜六铅四配铸”，雍正五年（1727）变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改“用红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金属铅）六斤八两、点铜锡（金属锡）二斤，配搭改铸青钱”，乾隆五十九年（1794）后恢复黄钱鼓铸，以铜六铅四搭配。^①可见，锌是清代制钱的主要原料，配铸比例长期稳定

^①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四《户部·钱法》；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七十三《户部·钱法》。

在 40% 以上。

清代前期，随着铸钱量的持续扩大，币材锌的用量亦从顺治十八年（1661）的 105 万斤增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 962 万斤。^① 据笔者研究，从雍正二年（1724）至道光八年（1828），黔铅总产量达 8.72 亿斤，年产 839 万斤，其中，白铅产量占清代全国产量的 67% ~ 84%，绝大多数用于供给中央及各省鼓铸。^② 铅在清代制钱配铸中的比例过低，且仅在鼓铸青钱时掺用，作为币材的用量有限。但是，铅在清代的军事用途，即制造火器弹丸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笔者曾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认为清军火器常规操演，每年所需军铅在 20 万 ~ 26 万斤上下，这些黑铅绝大多数产自贵州。^③

由此可见，清代贵州是全国铅锌的主要产地，承担着京师及各省铅锌币材的供给重任。黔铅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经济运行，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战略资源。同时，清代军队所需军铅绝大多数来自贵州，黔铅是制造鸟枪、火炮弹丸的主要原料，关系清代的军备制造和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基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黔铅属于清代国家战略资源。

二 学术史评述

在清代，黔铅与滇铜均为国家战略资源，关系全国货币铸造和军备制造，理应铜铅并重。乾隆年间，谢圣纶称：“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④ 但地方官员却重铜轻铅。乾隆四十年（1775），吏部奏称：“窃思运京铜斤，关系户、工二局鼓铸，固应上紧趨运，严定处分，而外省派赴滇黔诸省采办铜斤等项，亦均关紧要。……且运京铅锡，与铜斤事同一例，原例内专言铜斤，不及铅锡，立法亦未详备。”^⑤ 嘉庆十一年（1806），上谕内阁：“京运铜铅攸关鼓铸；

^① 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 29 页。

^② 马琦：《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对以销量推算产量方法的检讨》，《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马琦：《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④ 谢圣纶：《滇黔志略》卷二十四《物产》，乾隆刻本。

^⑤ 《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九百九十七，乾隆四十年闰十一月，吏部奏。

乾隆年间曾钦奉谕旨，特派藩臬大员经理其事，业经定有章程，系指滇铜而言。其实钱局需用铜、铅并重，近年来各该省办理拘泥，于滇铜过境之日尚知照料催趲，而于船到境时则不复留意，以致节年京局需用铅斤多有迟滞，殊于鼓铸有碍，嗣后铜船铅、船沿途经过之处，著责成派出之各该省藩臬等一体实力催趲，毋得少有延误。”^①

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导致现存记载滇铜黔铅的文献多寡不均。关于清代滇铜的记载，除了实录、政书、地方志等文献之外，还有《滇南厂矿图略》《云南铜志》《铜政便览》等专门性文献，史料较为集中；而黔铅的记载则散见于档案、正史、政书、奏疏、方志、文集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搜集难度较大。清代重铜轻铅的思想也影响着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清代滇铜研究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成果丰硕，堪为清代矿业研究的代表；而黔铅进入学术视野才短短十余年，研究成果寥寥。

2007 年，温春来的《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清代黔铅的论文，作者在考察清代前期大定府铅矿产量的基础上，对其运输和销售进行了梳理。^② 2010～2015 年，笔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论著，分别探讨了清代黔铅兴盛的原因和背景、采冶技术、矿厂分布、产销量变化、运输路线、京运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以滇铜黔铅为例，考察了清代的矿业布局、奏销制度及其军事用途，^③ 极大地推进了清代黔铅研究进程，扩展了清代矿业的研究视野。

^① 《大清仁宗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嘉庆十一年六月，上谕内阁。

^② 温春来：《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生产与运销》，《清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参见马琦《清代黔铅兴盛的原因与背景》，《贵州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清代黔铅运输路线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对以销量推算产量方法的检讨》，《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矿业监管与政府调控：清代矿厂奏销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试论清代黔铅的地理分布》，周长山、林强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 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铜铅与枪炮：清代矿业开发的军事意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莲花”与“妈姑”：清代最大矿厂名实考辨》，《贵州文史论丛》2012 年第 3 期；《清代黔铅的采冶技术及其特征》，李昆声、黄懿陆主编《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云南抚仙湖与世界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清代前期矿产开发中的边疆战略与矿业布局：以铜铅矿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清代黔铅京运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 年第 2 期；《清代皇帝矿产资源观与矿政演变：以铜铅矿为例》，《文山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近十年来，虽然清代黔铅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一些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影响、清代黔铅开发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掘，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空间，如清代黔铅产量、矿厂、管理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清代黔铅研究的系统性专著，这对于学术界全面认识并了解清代黔铅开发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发掘新资料，对清代黔铅开发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三 研究内容和主要资料

本书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清代黔铅开发与产业兴衰，主要论述清代黔铅兴衰的原因和背景，从市场需求、产地转移、采冶技术、政府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清代黔铅的兴盛与衰落。（2）清代黔铅矿厂及其管理。在考证矿厂置废和时空分布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莲花、福集、柞子等大型铅锌矿的产量演变、抽买制度、管理机构等内容。（3）清代黔铅产销关系与储备调节。以清代档案中的奏销数据重建黔铅产销量序列，分析产销量变化原因，突出厂店储备制度在调节产销关系中的作用。（4）清代黔铅运销与管理。考证清代黔铅运销的数量与路线，复原黔铅的运销网络和管理体系，揭示京运的动态过程。（5）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在考证黔铅矿业人口和矿区所需物资的基础上，分析黔铅开发对贵州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及城镇发展的影响，考察清代黔铅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的关系。（6）清代黔铅矿务与贵州地方行政。通过考察黔铅矿利收入促进贵州公共事业发展、矿政兼顾下贵州地方行政的演变、矿政冲突对贵州地方行政的影响，分析清代黔铅开发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清代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数位典藏的清代档案，已经正式出版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奏折汇编。二是清代实录、政书。如《清实录》和清代五部会典、三部会典事例、两部户部则例。三是地方志书。现存清代贵州的省、府、州、县志及《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黔记》等